

Heidegger & Nazism

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

◆〔德〕维克托·法里亚斯 / 著

◆ 郑永慧 张寿铭 吴绍宜 / 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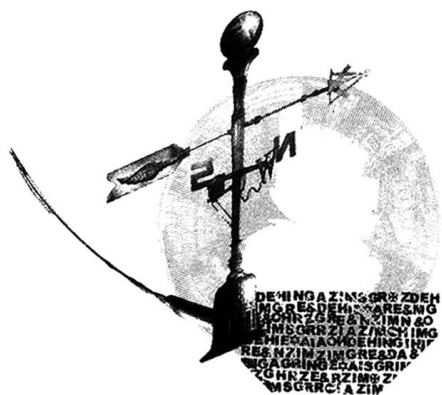
时事出版社

Heidegger & Naz

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

◆〔德〕维克托·法里亚斯／著

◆郑永慧 张寿铭 吴绍宜／译



时事出版社

前 言

古人认为，哲学是一种生活艺术，哲学告诉我们，在宇宙里，我们是何许人，告诉我们自然界的道理，并告诉我们存在的基本原理，使我们改变自身的生活，与真理保持一致。存在论与伦理学的这种巧合，前提是上帝存在于人的灵魂里，人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成为神。那么，将其信徒们的言行不一大白于天下，就是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与某种哲学较劲。

今天，我们当中认为自己有灵魂的人屈指可数，也不会认为灵魂以苦行为理想便得以净化。但我们确信哲学的威力：它令人们的思想言行相一致。同时，教生活与思索合拍。一个哲学家，若声言其生活与其思想无关，那他就被视作梦呓者，或被当成诡辩者；并且，从康德到萨特，从实践理性的种种格言到采取行动，他们都众口一词。然而，我们茫然无绪，乃至认为这规诫与研究海德格尔不相干，尽管谁要想了解柏拉图的政治观、笛卡尔的孤独，或者马克思的推理，谁就离不开这规诫。因为，海德格尔的著作，是特意脱离对存在者的唯经验主义或者形而上学的研究；这位哲学家的著作可谓凌驾于他自己的具体生活之上，与他在国家社会主义冒险的行动毫不沾边。在寻觅原初时间性方面，或许，这位不任公职的思想家走得太远了，他任凭自己的意愿去选择，好也罢不好也罢，与本书无关紧要。

我们懂得，对各派哲学作历史真实性解释的危险；我们知

道，一种体系从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阶级的生活条件的反映，并且知道，哲学有自己的生命图解，独立于世界进程。知的主体，不是有户籍身份的个体。卢卡奇（匈牙利作家、哲学家，1885—1971——译者）反对叔本华，可能会打动我们，因为他提醒说，叔本华把自己的剧院望远镜借给一名军官，这军官用来调整射击偏差，以镇压 1848 年的起义者们：可这无损于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。

算了。但毕竟，我们还知道，事物没那么简单。我们了解笛卡尔对政治的回避，在政治哲学上具有某种含义，我们还了解，他决意在这领域里破旧立新，今天我们体会到内中之价值与益处。叔本华的行径，与他对康德伦理学的批评不无关系；而洛特曼及卡瓦莱斯的勇气，在于通过实践把真实形象表现出来，他们从事深奥的研究工作，善于勾划出真实的形象。

尤其有这问题：加入纳粹党，不是一般传记里描述的事实，因为，纳粹主义无法跟周围世界的任何政体相题并论，无论是什么政体：纳粹主义并非世界上的一种政体，甚至不是先前某种统治体制的延伸或者蜕变。也许，确实如此：这位哲学家如通过日常生活诸事件介入社会，就不会引起哲学界的关注。然而，纳粹主义不仅破坏了被其侵略的多种文化；而且，还破坏了一个为发展文化从一开始就会采用的社会形态本身。因此，海德格尔把自己的信仰奉送给纳粹政治，这是有失身份的不得体行为，在那样一个预先定型的社会里，他的这般行为更能保障其生存权利，为此，要让死亡的冲动取胜，要把文明的种种必要形态，不管是象征性或想象中的形态，压在冲动的死亡脚下。海德格尔的传记，所记叙的只不过是，他早打定主意，要与死亡的冲动站到一起而已。

无法拿纳粹主义同这种或那种政治相比较：纳粹主义既不是比普鲁士王国更专制的一个体制，也不是比“恐怖时期”（指

法国大革命 1793 年 5 月到 1794 年 7 月这一阶段——译者）更残酷的一场革命，不是比莫尔（圣·托马斯·莫尔，1529—1532 年任英国首相，因主张无政府主义反对亨利 8 世被砍头——译者）的乌托邦更危险的一种乌托邦，这是一项灭绝政策，靠某种别出心裁的世界幻象支撑，这是一整套实践与创新，原有形态的现代国家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总之，这是某种世界幻象，企望改造德国人，乃按照某种毫不动摇的种族主义原则，并以“大地”与“鲜血”的狂热为基础。应回顾一下这些浅薄的大实话，那个时期，人们常说：半斤八两差不多，海德格尔投身纳粹党，也没什么大不了，超不过法国人对“公安委员会”（法国大革命时，雅各宾派专政的重要机构——译者）的热情。但反过来，若抓住问题的要害，这就变得异常严重：如果说，希特勒主义的核心思想，是“最终解决”，如果说，灭绝营连同他们的毒气室，是纳粹主义的“实体”的话，那么，这位哲学家赞同这样做，其传记要表达什么意思呢？

我们应如何读他的著作？作为“纯”哲学的书本或课堂讲义的专著，跟属于思想家公职生活的那些演说词、文章，还需不需要区分开来？话说到此，如何使人信服，他既是非公职人员，又是公职人员；而同时，又如何不致让人错以为：这位名符其实的公职人员，是固守在他的图书馆里的哲学家，但另一方面，这位希特勒式的演说家、热忱的大学校长、积极分子，从哲学及他本人赌注的角度看，他仅只是个影子，一个几乎背离现实的幽灵呢？

人们定会反驳说：应该证明，海德格尔赞成纳粹主义，应该证明，他构筑的存在论有一些东西与纳粹主义共鸣。

我们至少了解到：海德格尔顾及存在的真理，从不贬黜具体生活世界、从不贬黜体验。具体生活世界与存在的真理，不像内在与先验那样势不两立，而此在（Dasein）就是这个实在，

体验与存在论结构在实在里结合，存在论结构准备供其使用之。引人注目的是，《存在与时间》里，分析刚健、真实性强，恰好取决于存在论与经验的这种结合。如果说，此在指明实在的一个瞬间，这毫无疑问。如果说，对“向—死亡—存在”的分析解蔽我们的认识只能遮蔽的真理，如果说，海德格尔从哲学体系探索的这个瞬间，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们才会获取的成果：并非从一般意义的真理中涌现，也不是从理解力的效果中涌现，而是从某种实在的事物中涌现，实在对推理提出置疑，因为实在确信，自己具有自身最初本原的特性，这毋庸置疑。但难题依然未解决：海德格尔着手探究此在，竟然到他眼中的本真存在、到身着冲锋队制服的弗赖堡大学生们及劳动者们的存在中去探究，是为何又是如何呢？

维克托·法里亚斯这部书的最大优点是，很全面地回答了实际问题和历史问题：海德格尔成为纳粹分子，是偶然的吗，既然他始终不渝，履行纳粹誓约？这个绝对先决的问题，向有史以来其中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提出来，涵盖了我们哲学的命运，以及我们文化的构架诸问题。

维克托·法里亚斯首先告诉我们，海德格尔在希特勒上台前，业已热衷于一些政治上令人无法容忍、伦理上又无法为之辩护的主题深化活动。亚伯拉罕·阿·桑克塔·克拉拉的形象，这位巴洛克年代维也纳最辛辣的大名鼎鼎的布道者，仇视犹太人的精神思想象征，既是海德格尔处女作的题材，也是他1964年讲座的中心内容：从降生到谢世，思想家海德格尔与这位布道者，可算得上是暗中形影不离，他颂扬道，这位教士笔下是创造性的并有预言性的语言。

由此，问题便提出来了：应该了解，海德格尔是否真赞同纳粹的政策，抑或是，他仅满足于暂时任弗赖堡的校长，且在实行大屠杀之前就辞了职，并中断了与当局的关系。

法里亚斯揭示说，直到1945年，海德格尔仍交纳党费（在柏林档案馆，他找到了这位哲学家的纳粹党员证）。不过，仍存在他被强迫入党的可能性。我认为，法里亚斯明确指出，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。任校长期间，海德格尔大力支持罗姆的极端主义路线；在其所在城市，目睹犹太大学生诸联合会被摧毁，联合会办公处全被洗劫一空，联合会成员们被暗杀时，他没有丝毫批评的表示：有人当面向他诉说这些强暴行径，他只做了个手势，让人去把那些会址打扫干净。海德格尔不会不知道，在巴登地区，在弗赖堡附近，就有一些集中营，里面的被拘禁者们正被运往达豪处以死刑。他曾两次告密，尽量做得天衣无缝：胡戈·奥特——是法里亚斯列举的——告诉我们，海德格尔笨拙地用打字机打他自己的告发信，他还细心留神，避免档案里留下蛛丝马迹，犹若他为自己最不令人生疑的行为，也诡密地设下层层防线，如此这般小心翼翼，是最卑劣纳粹机构才会有的范例。

维克托·法里亚斯证实：海德格尔与官方政策“决裂”了，不是撤回，更说不上开始反抗。“决裂”是“大刀之夜”时，“极端革命”派系失败的后果之一。海德格尔批判主流派相对的妥协与观望主义：可见，海德格尔支持冲锋队的大学生领袖，但当时依照“政教协议”，由一位天主教徒接任大学生领袖。直至二战后期，什么都阻止不住海德格尔支持德国哲学；各派别之间的仇恨，使他遭到几个显贵的敌视，招来罗森贝格发布的“放逐令”，不过，他得到戈培尔及意大利最上层当局亲信的支持。这些方面本书作了详尽分析。这确是一部政治传记，因为，主人公在纳粹大学里一直扮演极突出的政治角色。

法里亚斯的笔法条理性强，纤丽细腻，个人心境描述着力不多，却向我们指明权力的脉理、机构的构架，直至诸多委员会的组成，或有关杂志领导班子的人马。海德格尔与其接触过

的纳粹党及纳粹国家的所有人物之间的交往，本书作者都明白出示。该关系网显示，这位哲学家政治上处于“洞穴”中。意欲否认海德格尔曾是纳粹，只要不把这些关系放在眼里，并将其视为无关痛痒，就行了。那样的话，这位思想家就在纯实体里生活，海德格尔就似乎是无辜的，与任何真正的犯罪行为沾不上边。可是，他在某某或某某党卫队成员的羽翼下发表作品，难道也不足挂齿了！至于从实体论角度释读他的人生，没什么证据能说明，他加入纳粹党是他本人亲笔；但这位哲学家投身纳粹，仿佛不像是被那些派别和机构拉进去的，事实上，至少据他独自发表的多次演说分析，他是乐意在里面露脸，那些演说词就让人难以容忍。自1945年以来，涉及到海德格尔，那些不愿把纳粹问题提出来的人，他们的逻辑，是极端实体论的一种逻辑：海德格尔他支持过何许人？他在何处发表过著作？他接受过何人之助？关系不大；成问题的，单单是他内心静思这始料不及的纯洁性；海德格尔像是个单子，看来，在希特勒当政时，他享有怪异的特权：既不反映也不表达任何观点。

德国高校从洪堡（德国19世纪语言学家——译者）起，要求不受国家的约束。现在大学须“守规矩”，被冲锋队及党卫队清洗、控制。观念学者们心目中，最抽象、最不让人感兴趣的那些从属学科，语言学，文献学，是酝酿中被改造的对象，正受到监督；将开设一门雅利安人语言学，和几个文献学科，由党卫队掌握。就在这种氛围里，海德格尔对语言、对真理，或对诗歌的分析研究，得到发展，并被发表。

可见，在国家机器最令人忧虑的那些部门与最“无人问津”的大学学术研究之间，进行着某种经常性的交流：存在论研究政治了，就在我们眼皮底下。

友谊与合作的问题则更严重：在整个纳粹时期，海德格尔亲近欧根·菲舍尔，相当忠于他，在战后的年代里，还寄给他

一本亲笔题词的著作，但海德格尔怎会不晓得，菲舍尔作为“柏林种族卫生研究所”所长以及党卫队成员，对极端的恶果负有责任呢？

自然，海德格尔无论在哪儿写文章，也不曾说自己拥护灭绝犹太人；然而，法里亚斯揭露说，海德格尔采取了若干条措施，反对“非雅利安人”。此外，尽管是秘密，但他跟菲舍尔，还跟直接参与“医学”试验及灭绝政策的别的负责人，经常有来往，他怎么会毫无所知呢？战后，大家都了解菲舍尔干的什么事，可他为什么缄口不语？

也许，在这里，我们找到赞同这个关键性问题。海德格尔的校长职务，不是单纯的柏拉图学园式的差使，外加几项妥协。校长任期结束时，该哲学家仍是纳粹；他这纳粹主义，不是装点门面，闪烁其词，畏首畏尾，却是真正地投入战斗。您将读到有关译文，以便核实，海德格尔调动了多少极为丰富的概念用于政治；他撰著哲学论文、发出号召、发表演说，甚至连写信，都穿插进行。说到这，怎能否认海德格尔支持过罪犯呢？

有人会说：更多情况下，这种支持是默认与说谎，而非同意也非参与。但，如此推论，太过混淆视听，用太多的理想主义的类比，以至不能水落石出，让人大失所望。还是让我们勉力把握好方向：从西班牙战争到“解放”，反纳粹的战士们正忙于与他们眼前的独裁制度作斗争，而在同一时期，有一位哲学家正在他的街区、在他的窗下眼看着独裁制度取胜，却给以支持，这两类人之间，哪里会有什么共同之处？退一步说，乔治·波利策（法国现代哲学家，1903—1942——译者）——只举这一个例子——不曾批判斯大林，这有可能。退一步说，他不如海德格尔那么伟大，这也有可能；但是，支持罪犯问题，不同于体系概念丰富与否问题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乔治·波利策，很

早就抱有必须抵抗希特勒的坚定信念，他被维希部长亲手折磨死。这样的人生，其价值体现在哪里？批判斯大林，还是参加抵抗运动？人们岂能说，波利策一边抵抗希特勒，一边容忍斯大林的罪行？谁看不到，这样搞平衡是亵渎，有人用一个承诺把两个天平盘摆平，难道正义的均衡点要被取缔？

相反，我们认为，在存在论里，如同在生活艺术里，均有一些论题也有一些实践，“有的轻如鸿毛”，另一些则“重如泰山”！

把自由问题与“无产阶级”等量齐观，就搀进不少幻想成份。但毕竟，在那些与罪犯作斗争的人们心灵里，该幻想投下的一团暗影，不至于到那等程度，竟解除那些罪犯们的罪责。某些人从无产阶级世界的前景中悟到，有理由到工厂进行斗争，为入境移民争取各种权利，假使道义行为果真以假象为基准，那或许是件可悲的事，但终归他们是为这些权利与这正义，绝非为种族卫生，为冲锋队的英雄气概，去思考，去生活。海德格尔善于使自由及其主体这道难题，与应被称为道德歪理的东西脱钩。他自以为能够完成谢林或黑格尔所开创的自由问题的位移。不必再问：在何种条件下，人可能是自由的；而应提出：在何种条件下，生存环境的存在，从根本上，为生存者们的自由，奠定了本真存在的基础。由于海德格尔以他自己的方式，回答这个问题，所以，他也把捍卫自由的英雄与某个表象捏到一起。然而，这个表象没能为任何具体的自由效劳，应该说：是为灭绝政策的暴行，只能为灭绝政策效劳。

是海德格尔存在论不容置疑的重要性，使其罪行问题值得一提。二战以来，海德格尔成为法兰西人的哲学家。是在法国，他的思想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响；是在法国，其思想被看作跟现代发生的事件完全契合的哲学。对技术取胜的分析，或对形而上学结束的分析，海德格尔已成为哲学史导师，在我们心目中，从哲学视角看，他这部哲学史，大概是唯一有连贯性的。柏拉

图、亚里士多德、康德、黑格尔，以及存在思想的希腊开端，我们思索他们时，别无通途，只能沿着海德格尔给我们开辟的路径。他的思想于许多研究者，都具有明确性的效应；除去马克思主义，尚无任何其他哲学，能在法兰西获此殊荣。存在论就这样有条不紊地，以解构形而上学而告结束。

可笑的是，力图把“好”海德格尔与“坏”的海德格尔区分开来，犹如某些书被“玷污”了，因他拥护纳粹主义，而另一些书则安然无恙似的；这有点像在黑格尔哲学里，人们力图从“死去的東西”里识别出“活生生的東西”那样，是一码事。当然，维克托·法里亚斯的调查结果，哪怕多么微不足道、史学家的口吻多么显见，但是，其成果为人所接受，被确认，并得以增补；显而易见，马克思逝世后，是海德格尔呈现在我们时代“无法超越的视域”：对这显而易见之说，必须重新考虑。必须重新着手研究存在这个难题的历史。

海德格尔的功绩在于，把存在论当成我们时代的议题。可是，哲学诞生时，探讨“正义地生活”的苏格拉底（柏拉图曾求教于苏格拉底“什么是正义”的问题，柏拉图的全部对话总主题，可冠之以“什么是正义”——译者）正受审判；哲学步入黄昏时，海德格尔想看到诸神的末日（此处影射尼采的《偶像的黄昏》，理查德·瓦格纳的《诸神的黄昏》，海德格尔的《尼采的话“上帝死了”》——译者），这却是“黑夜与迷雾”的时代。对此，人们如何接受得了？

克里斯蒂安·让贝

序 言

研究一位思想家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时，超出分析抽象观点及抽象含义的框架，在所难免。的确，哲学和政治观点按其本义，不仅是反映表现自身的界限，同样也反映捍卫这些哲学和政治观点的人们的客观实践。因此，阐释工作必然包括三个分析层次：客观的历史背景；思想家作某种政治抉择时的具体实践；思想家所提出的观点的系统含义。当然，此含义不能从已知的客观背景中被剔除。然而，倘若不考虑产生这些观点的背景、不考虑这些观点指导下的实践，人们亦不能完全懂得这一含义。

1962年吉多·施内贝格尔出版了一些从未公布过的文献，这些文献有力地说明：1933—1934年¹，马丁·海德格尔思想上和组织上完全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党。有了这些出版的文献，才能真正开始思考我们的主题。不过，这些文献离不开历史背景，正如与这位哲学家的政治实践也密不可分一样。但是，接下来的研究工作，是专门澄清纯抽象的难题。卡尔·勒维特和格奥尔格·卢卡奇²就此研究了若干年，后来，施内贝格尔提供的文献被系统研究；所有的研究人员或是强调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党³的联系，或是否认海德格尔与该党有染⁴，却都完全忽略了要澄清事实，须审视已掌握的文件材料。

经多年系统研究，我们在此谨奉送首批成果；其中某些方面尚有待今后补充，因为，不少重要的原始资料仍难以查阅到⁵。

从一开始接触施内贝格尔公布的资料，我们就意识到，为使研究结果切实可信，有必要参照海德格尔的履历，从中找出他参加“国家社会主义党”的历史原因，此外，应根据这位哲学家后来在政治和哲学上的发展变化，对他投身政治斗争进行分析。

我们的中心论点如下：海德格尔经过长期的准备，才决定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党。必须追本溯源，到奥地利基督社会运动中找原因，该运动的特点是保守而且反犹；必须到该运动使用过的熟语中去找原因，该运动汲取这些熟语，是在海德格尔出生并开始求学的地区（梅斯基尔希，康斯坦茨）。参照历史环境和青年海德格尔的作品（尤其是他的处女作，写于1910年，献给奥古斯丁派布道者亚伯拉罕·阿·桑克塔·克拉拉），人们看到，一种思想逐渐形成，饱蘸了专制的、反犹的、极端民族主义的传统；这种思想把祖国神圣化，但对祖国的理解却是最狭隘的；这种思想与激进的民众主义并行不悖，具有浓厚的宗教内涵。从自成体系的视角看，他这思想的发展，经历了《存在与时间》（1927年）提出的思考阶段——对历史性、对“本真的”共同体——中——存在的思考，对他与人民的关系、他与英雄人物的关系、他与斗争的关系的思考（§74）——海德格尔受约克和狄尔泰（§77）的启发，把社会生活中的民主制度拒之门外。

马丁·海德格尔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，绝非机会主义的权宜之计，也不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。这显而易见，因为海德格尔甚至当弗赖堡大学校长之前，就表现出是国家社会主义分子，更何况作为校长和党的积极分子，他脚踏实地的政治实践有过之无不及。无论是他促进纳粹大学改革的行动，还是他那时的著作，都昭然若揭地表明，海德格尔1933—1934年是党内一个派别的政治活跃分子，这个派别觊觎霸主地位。在那个年代，纳粹主义的政治总路线，是各个派别激烈争斗的目标，马丁·海德格尔选择了以恩斯特·罗姆和他的冲锋队为代表的路线，并力图以自己的哲学为基础，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

变异理论，公开对抗阿尔弗雷德·罗森贝格和恩斯特·克里克，反对他们的生物学及种族主义流派。从人事角度看，这种对立体现为争夺纳粹运动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激烈角斗。

1934年6月，希特勒与右翼派别联手，清洗了罗姆。如此，罗姆的方案寿终正寝了，该方案提出过激要求，险些导致军事干预：大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巨头已担保赞助军事解决。这次清洗的后果严重，一是导致政治与智囊机构的整体垮台，而此前这些机构一直支持海德格尔的政治行动（尤其是纳粹大学生运动的领导机关）；二是切断海德格尔与纳粹党官方政治的关系。此后，他孤立无援。

自1934年6月起，这位哲学家坚信：纳粹分子们变成叛徒了，背叛了他们运动的原初思想体系。海德格尔认为，并非是他本人，而正是爬到国家社会主义党高位的领导层，背弃了真正的纳粹思想。至于纳粹当局，始终监视海德格尔，甚至要斗他，不过只把他当成某个帮派的一分子，绝非视他为不可救药的敌人。

马丁·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党保持组织上的联系，从不曾中断。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⁶档案馆保存的文献里，有关他的材料证明，直至二战结束，他始终是该党的积极分子，还继续交纳党费；这些文献还显示，他在纳粹党内从未受过谴责，也不是党内政治指控的对象。

通过查对马丁·海德格尔的政治实践，便可极翔实地了解当年他与纳粹运动的瓜葛，再现他当年的思想风貌。被我们视为关键的几个总体主题，我们进行了研究。

先分析海德格尔在纳粹运动内部的活动：他的目的是摧毁“德国各大学联合会”，代之以具有纳粹积极分子全部特点的机构。海德格尔与最激进的纳粹党部门协商，致电希特勒，要求完全封锁德国所有的大学，按海德格尔观点，德国的高校还不够“革命化”。

第二个总体主题：他竭力组建一个新的大学组织，先留着备用，尔后替代原先的“联合会”。海德格尔认为，原有的“联合会”无力担当“新纪元”赋予的责任。远在海德格尔当大学校长之前，他与恩斯特·克里克就进行了这方面合作。如此，在这个平行的“联合会”内，他极力安插了若干个重要的代理人，都是阿尔弗雷德·罗森贝格领导的“特别工作处”的。

第三个总体主题：他以什么方式当选弗赖堡大学校长，及某些插曲，这些插曲有助于了解海德格尔行使职权的方式。

我们作分析时，也论述马丁·海德格尔与纳粹大学生运动的关系：该运动由罗姆派控制，是非常激进的纳粹先锋队；而海德格尔的政治活动，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，是与耍阴谋的基层大学生们关系密切，本质上沆瀣一气。某种很特别的政治契约形式，把这位精神“领袖”与这个“民众的”基层联系起来，这个基层诞生了，力求改变传统德国高校“僵硬麻木”的体制。

第五类难题极其重要，涉及到海德格尔被任命，要他到“帝国”两所最重要的大学当教授：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。他可能拒绝了其中一个教席；不过，本书对这两项任命的过程做了研究，故此海德格尔和当局的关系特点，无论是在1933—1934年，还是这之后，都一目了然了。所以，进行比较之后，我们先介绍纳粹党当政前的任命程序，我们认为这很重要：在魏玛共和国时代，海德格尔曾被指派到马堡、弗赖堡、哥廷根和柏林任教。研究结果充分证明：尽管存在分歧，纳粹当局及其官方机构，从未把海德格尔视为顽固不化的对手，他自己的确从未有过敌对的表现。海德格尔与当局的和谐关系，从没中断过。在弗赖堡辞职以后，他的许多行为表现也证实了这一点。显然，人们会想到，兴登堡去世时，海德格尔发表了讲话，旨在促使希特勒荣登总理及国家元首的宝座。当然还有“帝国讲师科学院”的事：海德格尔是应教育部之邀，制定一份详尽草案，

不仅如此，而且，我们能参阅的文献还证明，教育部曾考虑委任海德格尔出任该“科学院”的院长，创建该“科学院”的用意是，按政治标准挑选新一代大学教授。

同样发人深思的是，海德格尔与罗森贝格及纳粹党的其他一些重要人物，受“帝国司法部全权代表”汉斯·弗兰克的招请，组成“法律哲学委员会”，这是“德国法权科学院”的一个重要机构，由弗兰克亲自领导并组建，此机构要以新日耳曼法律代替罗马法。在同一时期，海德格尔开讲座，在纳粹制度最重要的政治学校里举行：柏林的“德国高等政治学校”；主讲人还有：鲁道夫·赫斯，约瑟夫·戈培尔，赫尔曼·戈林及阿尔弗雷德·罗森贝格。海德格尔持续举行讲座，起码直至1935年。

另外一个总体主题：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的文学活动及其方式。他的作品为一般公众所接受，尤其被当局认可。我们的剖析还包括：他发表的著作的政治背景、出版目录暨年表。因此，我们不仅能查明，1933年的《校长致辞》于1937年再版；而且我们确认，论《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》，是1936年在罗马一次讲座上的讲稿，发表在《内在王国》杂志上，讲座在“罗马日耳曼研究所”内部举办，是德国与意大利当局合办。同样，发表题为《追忆》这篇文章的背景，是为纪念荷尔德林逝世100周年（1943年），得到官方的支持，当局企望借着出版载有海德格尔这篇文章的卷册，操纵“荷尔德林协会”。还必须考虑，《柏拉图与柏拉图的真理理论》一文究竟采用了什么方式，能发表在埃内斯托·格拉西出版发行的年刊汇编上。尽管“罗森贝格特别工作处”起初反对，但海德格尔的这篇文章还是可以发表了：因为墨索里尼在1943年通过戈培尔，直接出面干预。墨索里尼这次干预，不仅突出显示了海德格尔当时在政界仍拥有关系户、显示了他对那时代产生的影响，而且，也反映官方决策

机构矛盾重重，为夺得支配权经常争斗。

透过上述诸总体主题；人们顿觉，了解了马丁·海德格尔的政治和哲学活动，从新的视角审察其体系蕴含的意义。当然，在哲学—政治方面，倘若不考虑海德格尔后来的发展变化，也不足取。我们的研究结论是：海德格尔与现实中的纳粹运动“决裂”以后，即使他对事物的看法变了，但我们仍须顾及他显见的忠诚、他对某种纯纳粹式底蕴的忠心，这自然表现在他特有的姿态和风格上；否则，人们亦无法真正理解他后来的发展变化。举两个例子为证：时至1953年，马丁·海德格尔仍警惕自己不背弃原有观点，他肯定纳粹运动的“伟大及其内在真理”；世人普遍认识到，希特勒主义惨无人道，但海德格尔却一再直接了当地拒绝认错。从他教尼采的哲学课，直至他死后出版的对《明镜周刊》记者的谈话（例如，这次采访谈话中他断言，当法国人开始思考时，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讲德语），只要人们查核他整个生涯，便明显看出：海德格尔对具有国家社会主义特征的一系列主张，永远忠贞不渝。

如果忽略了他这种忠诚，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：他歧视的信念根深蒂固，坚信德国人的才智高人一等，这信念植根于他们的语言中，与他们的命运攸关；他抬高自己思想的身价，认为继荷尔德林之后，他也是促进人类思想发展的典范兼导师；他从根本上反对任何形式的民主。时常有人明确地说，想要尽量缩小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的重要性。与此相反，研究资料之后，我们认为，借助于这联系，海德格尔的思想才得以与他自己的过去衔接、与过去的整个时代相衔接；而且借助于这联系，海德格尔思想往后的发展变化⁷，才从本质上显现出来。